

#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刘军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关键词:**唐代;宰相;科举;贡举;制举;吏部科目考试;选官制度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4-0012-07

选拔官员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历代统治者对此都非常重视。两汉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是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主要是九品中正制,隋唐及以后主要是科举制,但隋唐及以后各朝代的科举制在考试内容、程序、录取人数、及第后的待遇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都经历了一个产生、完善、定型、蜕变、终结的漫长过程。同时,这3种制度之间又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轨迹,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虽然它们在具体考核的内容、方法、程序上不尽相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为朝廷选拔治理人才。当然这3种选官方式在当时都非唯一的选拔方式,而只是最具特色的选拔方式而已,如在唐代除科举选拔官员外还有门荫入仕、征召、献赋、流外入流等选拔方式。本文主要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

## 一、唐代宰相与贡举、制举及吏部科目考试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是由两汉的察举制发展而

来,也是九品中正制衰落的产物。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关于唐代科举制的起源,杜佑说:“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制。”<sup>[1]</sup>唐代科举制是在隋代科举制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并初步定型的产物。唐代科举制主要包括贡举和制举两种。

贡举,又称常科。唐代参加贡举的人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央和地方学馆的学生,称为生徒;一部分是地方政府举荐的自学的士人,称为乡贡。生徒需通过学馆的考试,才可以参加贡举考试;乡贡是自己到所在州县报名,通过州县举行的考试后,再由州县举荐到礼部,参加贡举考试。唐代的贡举考试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前由吏部考功员外郎负责,以后改由礼部的副长官礼部侍郎负责,或者由皇帝指定其他官员临时负责,称为权知贡举。贡举考试的时间在每年的正月至二月之间,地点一般在长安。唐代的贡举主要有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秀才科因考中的人很少,而且多名不副实,不久就被废除了。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是为政府专门机构选拔人才,科举及第后工作也限

收稿日期:2013-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YY014)

作者简介:刘军华(1972-),男,陕西大荔人,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生。

于本机构,一般很难升迁,参加的人较少。因此,贡举六科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终唐世为常选之最胜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sup>[2]</sup>王鸣盛指出了唐代贡举科目的主要特征。

明经是唐代贡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关于明经考试的内容,《新唐书·选举志》中说:“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sup>[3]</sup>由此可知,明经考试的内容包括帖经、经义问答及时务策。唐初明经考试主要考时务策,由于参加明经考试的人不研读经书,只是熟读、背诵一些对策文章,缺乏对经书大义的了解,没有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因此,唐高宗下诏规定明经考试需加试贴经,贴经通过后才可考时务策。后来贴经多考查孤僻字句,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意义,于是明经考试中又加上了经义问答。在唐代科举中,明经考试主要考察应试者熟读、背诵儒家经典原文及注释的能力,而进士科考诗赋则重视应试者的文学才华。因此,唐代文人普遍重视进士科而轻视明经科。在唐代科举史上,明经科的地位不断下降,而进士科的地位不断上升。

唐代文人入仕主要有3条途径,分别为科举、门荫、军功等方式,其中科举中的贡举入仕者逐渐成为宰相的主要来源。贡举入仕者又可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类。唐代前期明经出身的宰相主要有张文瓘、裴行俭、裴炎、李昭德、狄仁杰等人,他们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很有作为;唐代后期有卢迈、贾耽、元稹等人,这些人都不以政事见长,在政治上无所建树。在唐代历史上,明经出身的宰相不断减少,而且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弱。

进士科是唐代科举中最重要的科目。进士科最初只考五道时务策。由于应试者不读经史,而重在模拟他人文章,因此,唐高宗调露二年(680),朝廷规定进士考试加试帖经和杂文两篇,进士考试就由一场变为三场。清人徐松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转能用诗赋,当在天宝间。”<sup>[4]</sup>按徐松所说,杂文最初为箴铭论表一类的应用文,后来在天宝年间演变为诗赋。但是也有人认为在武后至唐中宗时期,进士考试已经以诗赋为主。因为“主司褒贬,实在诗赋”<sup>[1]</sup>,进士科又称为“词科”。进士考试的顺序为贴经、杂文、试策,通过前场考试才可以参加后一场考试,即每场决定去留。后来贴经的地位不断降低,诗赋越来越重要,最

后出现了“贱贴”。唐代人非常推崇进士科,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sup>[5]</sup>唐末人王定保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sup>[6]</sup>在唐代宰相中,以进士出身者人数最多,而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欧阳修说:“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sup>[3]</sup>唐代进士科中出现的人才最多,诸如张说、张九龄、陆贽、李绹、裴洎、裴度等人都成为国家大臣,并担任宰相。但进士及第者中也出现了李逢吉、皇甫镈、李训、崔胤、柳璨等臭名昭著的奸相。

制举也称制科。《新唐书·选举志》中说:“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sup>[3]</sup>制举是由皇帝颁布诏书举行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出有杰出才能的人。制举的程序为制诏、应试者自举或者朝官和各地长官推荐应试者、考试、授予官职或者出身。制举考试最初为口试,后改为笔试,一般情况下皇帝会亲临现场。制举考试最初仅考三道策论,开元九年(721)改为一道,后来又加试诗赋。制举的科目繁多,主要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制举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最为兴盛,后来逐渐衰落。大和二年(828),唐文宗举行了唐代最后一次制举考试。制举是为了选拔出有杰出才能的人,所以重在考察应试者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清人陶福履《常谈》中说:“盖士非泛览经史百家、博通古今、深明治体者,不能对策。故公孙弘答策,十不得一,沈约受策,仅知其半,闾儒如此,末学可知。视人器识,验人学术,试士之法,莫良于此。”<sup>[7]</sup>唐代制举及第者多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制举及第后的待遇要比贡举优越。杜佑说:“制举及第,特授予美官,其次与出身。”<sup>[1]</sup>制举及第且成绩优秀者当即授予官职,成绩差的人也可以获得出身,即所谓的官资。而参加贡举及第只获得出身,要想正式进入仕途还要通过吏部的释褐试,然后再守选。另外,制举及第后多在中央任职,升迁较快。普通士人之外,科举及第后守选的人和低级在职官员也可以参加制举,所以许多贡举及第的人都再次参加制举,以尽快取得理想官职。开元时期著名宰相姚崇是以制举及第进入仕途的,更多的唐代宰相是在担任低级官职时再参加制举,并且取得优异成绩而仕途畅达。著名宰相张柬之、张

说、杨绾等人都是进士及第后,先担任低级官职,再参加制举考试,才获得升迁。如张柬之“永昌元年,以贤良征试,同时策者千余人,柬之独为当时第一,擢拜监察御史”<sup>[8]</sup>;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sup>[9]</sup>;天宝十三年(725),杨绾参加制举考试,“时登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sup>[8]</sup>。张柬之、张说、杨绾等都是制举中的出类拔萃者。其他著名宰相宋璟、李峤、张九龄、裴度等人也是在参加制举后,仕途有了大的发展。范仲淹天圣五年《上执政书》中曾说唐代“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sup>[10]</sup>。王应麟说:“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sup>[11]</sup>这些都肯定了唐代制举在选拔人才方面的重要性。

研究唐代科举必然要论及吏部科目考试。唐代贡举及第并不能立即授官,而是在参加吏部释褐试后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守选才可以参加铨选,其中进士需守选三年,明经守选的时间稍长一些。随着科举考试次数的不断增加,唐代出现了守选人多而官位少的矛盾。在唐代,低级官吏任职期满也要停职再参加铨选,这样铨选的压力日益增大。总章二年(669)礼部侍郎裴行俭设立长名姓历榜,该榜及时公布不能参加铨选人的名单,使他们早日离开长安,回归故里,以减轻都城长安各方面的压力。开元十八年(730),裴行俭的儿子裴光庭担任宰相时实行循资格。循资格规定官职高者守选时间短,官职低者守选时间长,守选期满后参加铨选。循资格重在论资排辈,而忽视才能。循资格减少了铨选过程中的徇私舞弊,使铨选得以制度化,一些长期不能预选的人获得了官职。其不足之处在于限制了一些杰出人才的仕途发展,所以此项制度创立伊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就包括曾任宰相的萧嵩、宋璟等人。但是由于循资格有其合理性,它并未被废除。为了解决循资格造成的矛盾,朝廷就制定了吏部科目考试。吏部的科目考试主要有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以及平判等科。贡举及第者以及其他不想守选的低级官员都可以参加吏部科目考试,一旦考试通过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多是容易升迁的官职。唐朝中后期由于制举考试的次数不断减少,许多人进士及第后再参加吏部科目,取得优异成绩后,不等守选期满就进入仕途。另外,还有一些人进士及第后,既参加制举考试又参加吏部科目考试,或者多次参加这两种考试,以缩短守选的时间,并取得利于升迁的官职。著名宰相、文学家元稹明经及第后参加了

平判科,后来又参加制举,并取得优异成绩。科目、制举考试使元稹声名大振,并加速了他的升迁。唐德宗时著名宰相陆贽进士及第后,两次参加科目考试,科目考试使他很快在官场中脱颖而出。唐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的宰相、文学家都参加了吏部科目考试。科目考试、贡举、制举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目考试由吏部主持,属于选官制度,常科则由礼部主持,是为获取官资,制举则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第二,参加科目考试的人是有官资或者官职的人,参加贡举的都是没有官资的普通文人,参加制举的是二者兼而有之。第三,科目考试、贡举考试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每年都进行,制举则是不定期举行,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少,公元828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举行过。

## 二、唐代宰相对科举制的不同态度

自唐王朝把科举取士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起,朝廷内外对科举制就争论不休,褒贬不一。参与科举制论争的人,就身份而言有官员、思想家、文学家等;就官职而言,上迄二品宰相,下至七品官员;就入仕出身而言,有科举入仕者,也有门荫入仕者。在唇枪舌剑、众说纷纭的论争中,宰相中间也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反对并要求取缔科举制,赞成和维护科举制,主张改革科举制。宰相对科举制的态度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科举制的实践决定的,不同宰相之间的论争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完善。现对此做一简单论述。

在初唐对科举制的批评就出现了,武则天时期担任左补阙的薛登是其代表人物之一。薛登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引经据典,纵论历史上选用人才的得失,指出科举取士造成官员德行缺失、才非所用等现象。他极力抨击科举制,主张选用人才要察言观行,循名责实。中唐著名的思想家、官员赵匡针对进士考试说:“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於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sup>[12]</sup>赵匡认为进士科考诗赋,追求构思精巧,言辞华丽,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既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也缺乏良好的德行。中唐著名文人柳冕在给宰相权德舆的信中说:“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人以书判殿本,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

之者不末也。”<sup>[13]</sup>柳冕从理政、德行等方面否定了科举制。这些批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科举制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与此相应,唐代宰相中也有不少人对科举取士及文学之士颇为不满,其中反对最为尖锐的有杨绾、郑覃等人。

杨绾是唐代宗时期的宰相,进士及第,后以制举第一的成绩,被授任右拾遗,曾担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宰相。杨绾虽是科举中的佼佼者,但他对科举取士及文词之士却大加批评。杨绾担任礼部侍郎时上书唐代宗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讟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sup>[8]</sup>杨绾认为文人从小只学习当代诗歌,而不阅读经史,缺乏儒家的道德修养,却在社会上奔走钻营,四处炫耀,自我吹嘘,扰乱社会风气。他请求废除科举制,按照汉代察举制选拔人才。杨绾认为唯有如此,士人才能以身作则,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以达到天下太平。当时不少大臣与杨绾持相同的观点。唐代宗命令宰相们就此事进行讨论,“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其今岁举人,望且许应旧举,来岁奉诏,仍敕礼部即具条例奏闻”。唐代宗又询问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的回答与宰相们的看法大体相同。宰相和翰林学士都不否认杨绾的看法,但他们认为科举制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士人长期以科举及第为奋斗目标,所以不能突然废除科举制。他们希望朝廷能从长计议,实则是他们也没有更合理的办法可以取代科举制。

郑覃是唐穆宗时期的宰相。郑覃虽是以门荫入仕,但他坚守儒家道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郑覃精通经学,但不擅长文学。他非常嫉恨进士浮华的作风,并因此强烈反对科举取士及文学之士。郑覃对唐文宗说:“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sup>[8]</sup>他极端地认为国家之所以得不到治理,就是因为任用文学之士。郑覃强烈要求废除进士科。唐文宗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sup>[3]</sup>唐文宗的回答是平心之论。

杨绾、郑覃等人无视科举制的积极意义,简单地

要求废除科举制,甚至想开历史倒车,恢复两汉的察举制,这当然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们及许多大臣的看法反映出科举制在安史之乱后已暴露出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不足,科举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由此可见,少数宰相反对科举制的原因主要有3条:科举及第者缺乏实际的治理才能,道德品行不够,科举滋长了浮华的社会风气。因此,他们极力反对科举制,甚至要求废除科举制。但由于科举制有其进步性、合理性,现实中也并没有其它更合理的选官制度可以替代它,许多宰相和皇帝也都支持科举制,因此,科举制在唐代不但没有被废除,而且一直是唐代选官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制却在实践中日益完善。

李德裕是以门荫入仕,并且主张对科举制进行改革的著名宰相。唐朝中后期科举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并对社会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考试前,应试者弄虚作假,奔走干谒,沽名钓誉,使整个社会充斥着浮华之风;科举中,知贡举者收取贿赂,徇私舞弊,录取名额经常在考前就已确定;官场中,一些官员以科举为纽带,结成朋党,严重扰乱朝政。因此,李德裕对科举颇为厌恶,他曾说“好驷马不入门”<sup>[14]</sup>。李德裕在和唐武宗谈及进士时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sup>[8]</sup>门荫入仕者有其特长,科举及第者也有自己的优势,李德裕的观点未免有失公允,但也说明了科举及第者确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虽然认为李德裕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他也承认当时的进士确实比较浮华。关于李德裕是否反对科举制,学界尚有争议,但李德裕要求对科举制的相关内容进行改革确是事实,史书对此有具体记载。按照唐代制度,考试录取后,知贡举者要将及第名单上报宰相,经宰相认可后,方才有效。这叫做“呈榜”。宰相原则上对录取名单不置可否,呈榜只是例行程序而已。但是有些宰相却根据自己的意愿,私自篡改录取名单,干涉录取。李德裕在《请罢榜奏》中说:“旧例:进士未放榜前,礼部侍郎遍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谓之呈榜。比闻多有改换,颇致流言。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无畏忌,取士之滥,晨不繇斯。将务责成,在于不挠,既无取舍,岂必预知?”

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后便为定例,如有固违,御史纠举。”<sup>[12]</sup>李德裕的建议有利于防止宰相滥用职权、干涉科举,保证了科举的公正性。李德裕对科举制的改革还表现在处理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上。按照科举制的惯例,科举及第者在及第后要以门生自居,并拜谢主持科举的人,即所谓的“座主”。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唐朝中后期的一些及第士子与座主交往密切,并逐渐结成利益集团,在朝廷中共进退,进而形成党争。因此,李德裕上书朝廷说:“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sup>[12]</sup>李德裕认可文人在科举及第后拜谢座主,但反对此后再私下交往。另外,李德裕还要求进士考试停考诗赋,进士及第后严禁在曲江宴游等。李德裕的科举改革虽曾一度得到执行,但随着李德裕罢相,他在科举制方面的改革也被废除了。

在实践中对科举制进行改革的宰相还有李揆。李揆是唐肃宗时著名宰相,兼任礼部侍郎,他认为前任礼部侍郎在主持贡举时,不是注重考查士人的才能,而是专注于防范士人作弊。李揆认为这有悖于真正的求贤之道。他主持科举时,把《五经》、诸史及《切韵》等书摆放到考场,任由考生查询、参考,并对考生说:“大国选士,但务得者,经籍在此,请恣寻检。”<sup>[8]</sup>李揆大胆的做法得到大家一致赞扬,也得到唐肃宗的赞誉。主持贡举考试结束,李揆升任为宰相。李揆主持贡举时抓住了科举的根本目的,而抛弃一些细枝末节,是有见识、有魄力的做法。

唐代的科举制是两汉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把选拔官员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不仅起到了抑制门阀、奖掖寒庶、保证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作用,也有利于选拔出有才能的人,充实官僚队伍。正如封建社会的其他制度一样,科举制也是利弊共存。科举考试的目的、内容、主持科举考试者的素质、参加考试的人多而录取名额少等原因都制约着科举制度的作用。如果宰相只看到科举制的局限性,进而否定甚至要求取缔它,是不明智的。当然,如果宰相因循守旧,无视科举制度的弊端,一味抱残守缺,也不是一位有见识的宰相。李德裕在任宰相期间,针对科举制的

弊端进行的改革,虽然在他罢免宰相后都被废除了,但他的一些主张在宋代得到了坚决执行。科举制在唐以后的发展和完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唐代科举制的否定。科举制向着更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方向发展。

### 三、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干预

唐代文人入仕可以通过科举、门荫、军功等多种方式,但是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科举入仕逐渐成为文人入仕的最主要方式,并且愈来愈受到社会的重视。唐末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sup>[6]</sup>唐代科举无论是对上层士人还是下层文人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科举决定着他们能否出人头地,也决定着他们家族是否兴旺。唐代科举制虽然相对两汉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而言比较公平,但其公平性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早在开元年间,唐人王泠然就说:“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贱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sup>[6]</sup>到了唐代中后期,科举中的行贿受贿、营私舞弊更是屡见不鲜,豪门子弟科举之途畅达,寒门子弟科举之途坎坷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唐代科举及第的下层文人占参加科举考试总人数的比例远低于宋代,家族、权势、金钱、人际关系等无一不影响着科举。在影响科举的各种力量中,宰相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宰相对科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宰相干预科举录取和一些宰相曾经主持过科举考试两个方面。

首先,宰相凭借权力干预科举录取。宰相干预科举录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唐代,礼部侍郎或者以其他职务临时主持科举的人作为宰相的下属官员,应服从宰相的领导。另外,按科举制的规定,科举录取的结果也须经宰相认可。因此,唐代一些宰相就影响、甚至直接干预科举录取。李林甫和杨国忠对科举录取的干预最为典型。李林甫是唐代以门荫入仕且臭名昭著的奸相,他曾经凭借宰相权力直接操纵科举。开元九年(747),唐玄宗为选拔杰出人才,特下诏进行制举考试。李林甫害怕应试者抨击时政,殃及自己,就蓄意破坏这次考试。他对唐玄宗说:“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佞言污浊圣听。”<sup>[15]</sup>李林甫请求唐玄宗改变制举的程序。

在得到唐玄宗同意后,他操纵制举,对应试者求全责备,结果没有一个人考中。李林甫给唐玄宗说“野无遗贤”。诗人杜甫和元结参加了这次考试,结果都失望而归。杨国忠是唐代另一位有名的奸相,他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成绩欠佳。礼部侍郎达奚珣不想以优等名次录取杨暄,但又怕得罪杨国忠,就派儿子达奚抚去告诉杨国忠,以试探杨国忠的态度。结果杨国忠听后大怒说:“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骂完后,杨国忠策马扬鞭而去,根本不理会谈奚抚。达奚抚给达奚珣写信说:“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sup>[8]</sup>达奚珣只得以上等名次录取了杨暄。崔群为刘禹锡的儿子疏通关系,李德裕向知贡举的王起推荐卢肇等都是宰相直接干预科举的例子。由此可见,宰相对科举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担任礼部侍郎或者以其他职务临时主持科举之人的道德品行、政治才能良莠不齐,其中有些人在决定科举录取人选时首先询问宰相的意愿,或者揣摩宰相的意图,然后再行录取,借以卖弄人情,讨好宰相。李商隐是唐代晚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有没考中,直到第三次才科举及第。李商隐在回忆往事时写到:“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绚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词。故夏口与及第。”<sup>[16]</sup>公元836年,中书舍人高锴主持贡举,他因敬重令狐楚,就询问令狐绚与谁最友好。令狐绚说是李商隐,令狐绚并没有向高锴推荐李商隐。但高锴以科举为人情,当年就录取了李商隐。这种情况在科举中比较常见。

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记载,李俊最后一次参加科举时,担任国子祭酒的包佶极力向主持贡举的人推荐他。考试结束后,包佶途中拦住去向宰相呈榜的知贡举者,询问录取情况,结果发现并未录取李俊。包佶生气地说:“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主持贡举的人迫于情面,要在名单上涂掉一人换上李俊的名字,“请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处”<sup>[17]</sup>。李夷简因有宰相的呵护才幸免于难,而李温由于没有宰相的支持遂与及第失之交臂。范摅的《云溪友议》有这样一个故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贡举,酷

搜江湖之士。初春将放二十七人及第,潜持名来呈相府,才见首座李公,公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吴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sup>[18]</sup>。事实上,李吉甫只是随便问问,并非为吴武陵说情,但崔邠为讨好李吉甫,就临时在录取名单上加上吴武陵。唐人笔记小说中的这些记载生动反映了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

其次,有些宰相在担任宰相之前主持过科举考试。唐代在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主持科举的人或者是礼部侍郎,或者是由皇帝指定以其他职务临时负责科举的人。由于一些宰相或者担任过礼部侍郎,或者是曾经临时负责科举,所以他们都参与了科举录取,并在录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著名宰相高郢、权德舆都曾担任礼部侍郎并主持过贡举。高郢任礼部侍郎前,“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后,唯追奉宴集,罕肄其业。郢性刚正,尤嫉其风,既领职,拒绝请托,虽同列通熟,无敢言者。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sup>[8]</sup>。高郢担任礼部侍郎主持科举时,拒绝请托,抑制浮华之徒,录取有才华的下层文人,使科举中的不正之风得以扭转。张籍、白居易、戴叔伦等著名文学家都是在高郢主持科举时进士及第的。权德舆主持科举时,聘请为人正直,有学识的祠部员外郎陆修为主考官,帮助他甄别文章,鉴定人才。当时担任四门博士的韩愈向陆修推荐侯喜等十余人,结果许多人被录取。权德舆先后三次主持科举,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著名宰相,李翊、陈鸿等著名文人都出自他门下。《旧唐书》权德舆本传记载:“凡三岁掌贡士,至今号为得人。”<sup>[8]</sup>高郢、权德舆主持科举时量才录取,不徇私情,以为国家选拔人才为己任,得到人们的赞誉,也为自己赢得美名。

以其他职务临时主持过科举的宰相有陆贽、张弘靖、韦贯之、李逢吉、李程、李宗闵等人。他们的德行、才能直接决定着能否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以及应试者的命运。792年,陆贽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主持科举。他任用当时的文坛领袖梁肃为主考官,梁肃向陆贽推荐韩愈等饱学之士,许多杰出士人得以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绹、崔群、韩愈、李观等人,李绹、崔群后来成为名相,韩愈则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陆贽这一年录取的榜单被誉为“龙虎榜”。与陆贽相反,李宗闵主持科举时,信任、依赖杨虞卿,“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

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屑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sup>[8]</sup>。李宗闵、杨虞卿两人狼狈为奸,不以为国家选拔人才为念,而是通过科举结党营私,壮大自己的势力。无论是礼部侍郎还是以其他职务临时主持科举的人都肩负着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并决定着无数士人的命运。

由此可见,唐代许多宰相都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干预过科举录取,并对国家选拔人才及士人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结 语

总而言之,科举制是唐代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最终担任宰相。唐代宰相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许多人都因为手中的权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科举的录取。

参考文献:

[ 1 ] 杜佑. 通典[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 ]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M ].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 3 ]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M ].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 徐松. 登科记考[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 ] 王澐. 唐语林[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 ] 王定保. 唐摭言[ M ]. 北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 7 ] 陶福履. 常谈[ O ]. 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 8 ] 刘昫. 旧唐书[ M ].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 ] 刘肃. 大唐新语[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 ]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M ]. 成都:巴蜀书社,1988.

[ 11 ] 王应麟. 困学纪闻[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2 ] 董诰等编. 全唐文[ M ].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

[ 13 ] 权德舆. 权载之文集[ O ]. 四部丛刊初印本.

[ 14 ] 孙光宪. 北梦琐言[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5 ]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6 ] 李商隐. 樊南文集详注[ M ]. 冯浩祥,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7 ] 牛僧孺,李复言. 玄怪录·续玄怪录[ M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8 ] 范摅. 云溪友议[ M ]. 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ang Dynasty

LIU Jun-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ain cont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official admissi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ystem and also one of the vital ways to choose officers in Tang Dynasty. The cont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rich and complex, had a long process of evolu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reasons such as learning virtue, origin, and political views, prime ministers elected by imperial examinations showe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this system. However, many prime ministers we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ed in or interven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official admission.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he prime minister; civil examination for government degree; imperial examination; decree exam; test of official department; officials selection system